

紅色足跡 2  
香港淪陷期間，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縱隊展開空前絕後的「秘密大營救」，在日寇嚴密封鎖下，把何香凝、鄒韜奮、茅盾、梅蘭芳和蔡楚生等在內的數百名文化人士營救出來，轉移後方安全地帶，奇跡般地完成一場「最偉大的搶救工作」。元明十八鄉楊家村村，是這次大營救中極其重要的「中轉站」。當年親歷者、楊家村的後代楊永光現仍生活於此。楊永光日前接受《大公報》訪問時憶述，「日本仔來三次都捉唔到我，我伯父被打到半死，差點被放火燒，亦死都唔講。」他說，楊家村村民「從初始的警惕，到後來為保護游擊隊員寧死不屈，是共產黨的奮鬥精神感動了楊家人。」

大公報記者 劉越琦、常瑞瑤(文)  
文瀾、廣州地區老游擊戰士聯誼會(圖)

# 走訪「秘密大營救」中轉站 探尋紅色記憶

# 「東縱精神感動了我們」

九華徑，處滿歷史的地方，在香港淪陷期間，是進出九龍及新界的交通要道，也是東江縱隊活動的範圍。當年「秘密大營救」的路線分別為「西線」，行青山公路，經九華徑至沙魚涌，越過大帽山到元明十八鄉楊家村，然後渡過深圳河進入東安游擊區；東線，由九龍經西貢村、沙魚涌、淡水，進入惠陽游擊區。」

元明十八鄉楊家村，環境優美，綠意盎然，八十多年前，這裏是東江抗日游擊隊的中轉站，也是「秘密大營救」的中轉站。「那時候我大概五六歲，只模糊記得很多人來過，後來媽媽告訴我，共產黨的游擊隊經常帶來很多人，不，不，不，大部分吃頓飯就繼續上路了，小部分留下住一晚才走。」年屆八十五歲的楊永光說。當時的香港，社會治安十分混亂，新界區處在無政府狀態。土匪橫行，大小惡勢力佔據，趁機劫掠，無惡不作。從長官口中，從親身感受中，他憶述元朝居當年的恐慌，時刻擔憂受怕，有的害怕到「夜唔唔敢睡，頭先返嚟」，有甚至全家逃難，直到共產黨游擊隊的到來，才免受土匪騷擾。

楊永光說，當在游擊隊到來後，主動維持治安，表明為「打日本仔」先在此地，又主動約當地土匪「開會」，要求「唔好再騷擾百姓」。游擊隊「有檢又有入」，又組織起護村隊，慢慢得到居民信任。他們消滅或趕走惡勢力，包括當時盤踞在大帽山的土匪黃容等，令到秘密大營救行動更順利，增加村民、過境的民眾、被營救轉移的文化界人士的安全保障。

記者日前實地探訪楊家村，村子的後面是高低起伏的山巒，放眼四圍盡是樹林與田間小路，時至今日都沒有行車路直達，不難想像八十年前，該處是如何的偏僻難行。為東江游擊隊提供了「一個隱蔽的活動據點。土匪橫行的年代，村民對一切陌生人都不充滿防備，從初始的警惕，到後來配合游擊隊員抗日，楊永光說，是共產黨人的奮鬥精神感動了楊家人。」

香港淪陷後物資匱乏，當時日軍大營駐在港居民回內地，難民源源不斷，楊家村是陸路離港的重要「中轉站」，游擊隊把營救的人混入了難民的隊伍。經常有人在此過夜，有多人則在屋前禾坪暫作休息，「食一餐」就走，共產黨好人人，都招呼好多難民，早飯食飽，每天都有過百難民在門口食，食完先離開，持續了一個禮拜有多。年幼的楊永光更記得，「共產黨對我媽媽好好，態度客氣，仲會手煮飯。」

「日本仔來三次都捉唔到我，我伯父被打到半死，日本仔還帶來火放在門口，要換再唔講就要放火燒屋，伯父死都唔講出來。」在楊永光的記憶裏，從小到木蘭父輩講述他們經歷的各種戰鬥和艱難，抗日故事就是他成長中最真實的教材。還有祖輩世居的楊家村，作為「中轉站」在秘密大營救中發揮的重要作用。

陸路必經之地——適廬  
中國現代著名作家茅盾將這次營救活動稱為「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」。從他寫作的《脫險雜記》中，可以窺見當年那艱辛的「逃亡之路」：一九四一年九月九日，茅盾夫婦等人被游擊隊帶到皇后大道東的臨時集中點，扮成難民模樣，通過日軍檢查站，在夜幕掩護下登上停靠在避風塘的駁船，與鄒韜奮等人會合。一日十日凌晨，他們分乘二艘小艇迅速向九龍，並在油麻地在散休息。之後兩日，他們經荃灣，到元明十八鄉的適廬歇息一晚，再渡過深圳河。一月十三日，他們一行抵達東安游擊區的游擊隊臨時指揮所駐地白石龍，並見到了林平、游擊隊領導。



▲1941年，在香港的部分文化名人及知名人士(從左到右)陳啟幸、羅白迫、夏衍、丁聰、何香凝、洪道、廖夢羅、歐陽予倩合影。

## 小鬼交通員的「紙彈戰」

「要把抗戰精神傳承下去！」記者連日尋訪香港的抗戰足跡，老游擊戰士聯誼會會長林珍珍帶着記者沿着紅色足跡實地走訪。從烏蛟騰到元明十八鄉，一路走来，每個地方都有許多東江大營救的事跡，記者還認識了不同的戰術，如「紙彈戰」與「地雷戰」等，東縱英勇的形象在記者腦海中意見立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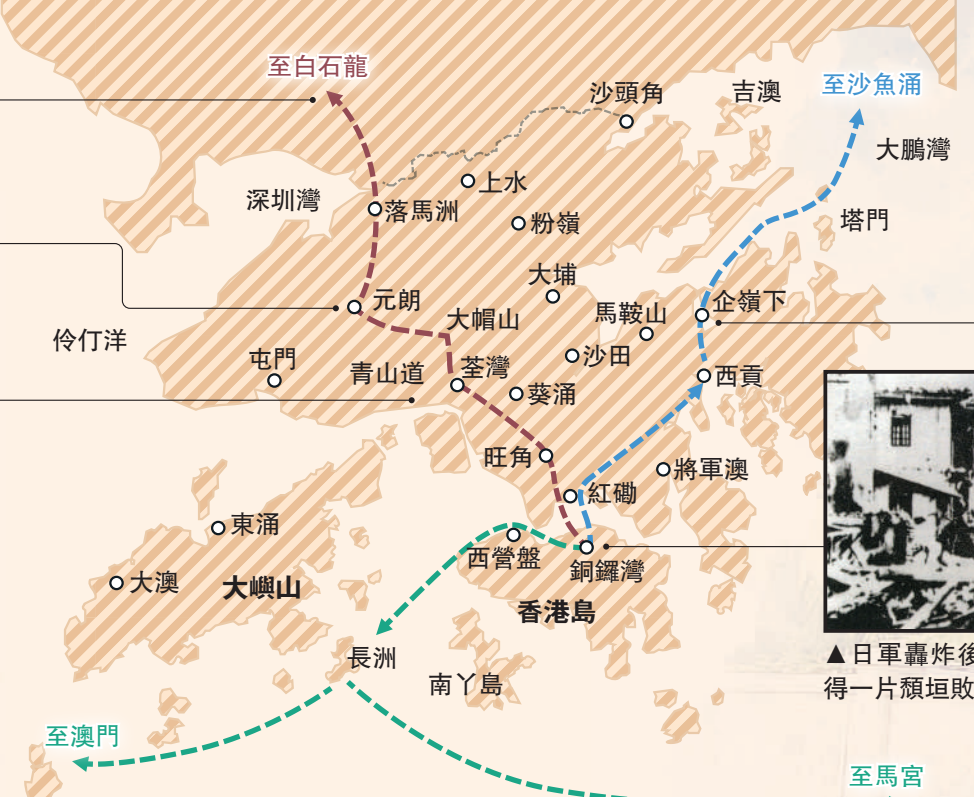
林珍加入游擊隊抗擊日寇時，年僅八歲，作為一名「小鬼交通員」，雖然她不能像大人們一樣夜襲日軍，也並非日軍都有「交通員任務」，但大部分時候，她在後方協助進行「紙彈戰」，幫忙印刷抗日文宣，派發宣傳單張。

林珍向記者描述，初期宣傳單皆由後方統一印刷，然後交到游擊隊員手中進行派發。而對工作充滿熱忱的「小鬼」們總是以最快的速度，在極短時間內就能將宣傳單派完，然後等待下一波傳單的到來。戰時本就時間緊迫，豈能虛度光陰？很快游擊隊員就在當地建起了簡易的「印刷工場」，以自制「印刷術」帶領「小鬼」們自製宣傳品，一邊製造一邊派發。實現了「自給自足，大家喜笑顏開，不遺餘力地進行宣傳工作，將共產黨抗日理念的一星星之火，送至香港的大街小巷。」

除了「紙彈戰」之外，「地雷戰」同樣也是港九大眾靈活藏敵，反「掃蕩」作戰的智慧結晶。據林珍描述，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一日，轟隆一聲巨響，震動了全港。市區中隊成功炸毀了九龍高打老街四號鐵路橋，幾支隊伍配合作戰，迫使日軍回探，「地雷戰」獲得很大的效果。她驕傲地說，「說明我們的部隊策略。這是烏蛟騰會戰後，由被動巧妙轉換為主動的戰鬥典範，證明我們的情報工作很準確。」

當時的交通要道有日軍把守，橫跨高打老連大街的鐵路天橋，離日本九龍地區憲兵本部約百米左右，橋上只通火車，不通行人。於是機智的「小鬼」將炸藥藏在竹竿裏，揚着竹竿跟着牛群，混過敵人的檢查哨，把子彈和雷管運到市區。林珍珍說，炸藥原料來自收集而來的英軍武器彈藥，「二人到連四號橋後，從斜坡爬上，把炸藥藏在鐵軌下，接上計時器，對準時間，爆炸了。」原來，「小鬼」同樣能發揮大作用！

## 二百日驚險海陸大營救



▲西貢企嶺下，是當年從水路營救文化人士返回內地的海上必經之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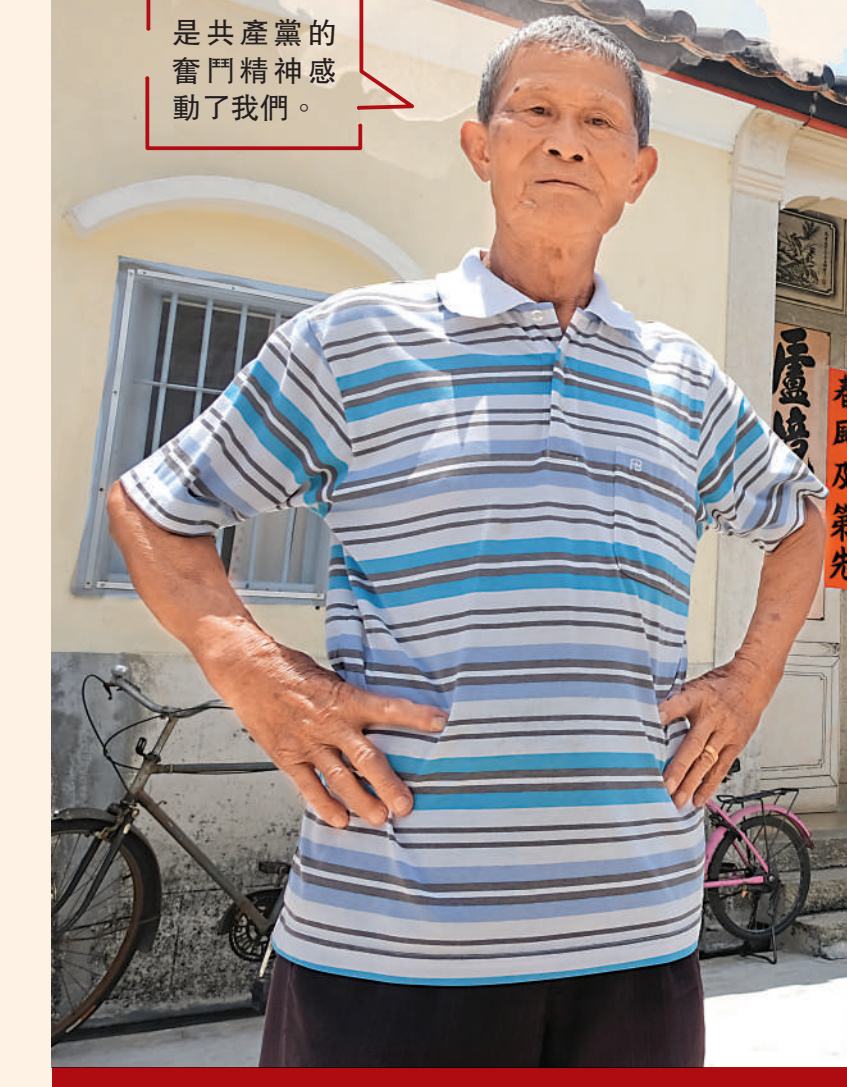
▲日軍轟炸後，銅鑼灣一帶變得一片頹垣敗瓦。

營救路線  
程序甲：首先，把滯留人士安全地送去九龍。  
●方法：由香港(銅鑼灣)→偷渡去九龍(紅磡)  
●打通維多利亞港的封鎖是開通營救路線的第一關。  
程序乙：(從九龍半島分水陸兩路撤離)  
1 陸路(西線)：由旺角→青山道→荃灣→元明→跨過深圳河→東安游擊區→惠陽  
2 水路(東線)：西貢→大鵬灣→沙魚涌→(東江游擊區)惠陽  
3 澳門線：長洲→澳門→廣東→廣西桂林。分水陸兩路：  
水路：由澳門搭船到台山→步行到肇慶→再坐船到梧州→乘車至桂林  
陸路：由澳門走開關到石岐的公路→到石岐後坐船到江門→步行去肇慶→再坐船去廣西

▲當年東江游擊隊曾在十八鄉組織營救活動，獲救的愛國人士和文化名人，由此渡過深圳河逃避日軍追捕。



元明十八鄉的大棠村楊家祠，是東江縱隊的重要交通站，很多文化人經此地到達東江游擊區。



▲「要把抗戰精神傳承下去！」楊永光及林珍向記者娓娓道來那些年的抗日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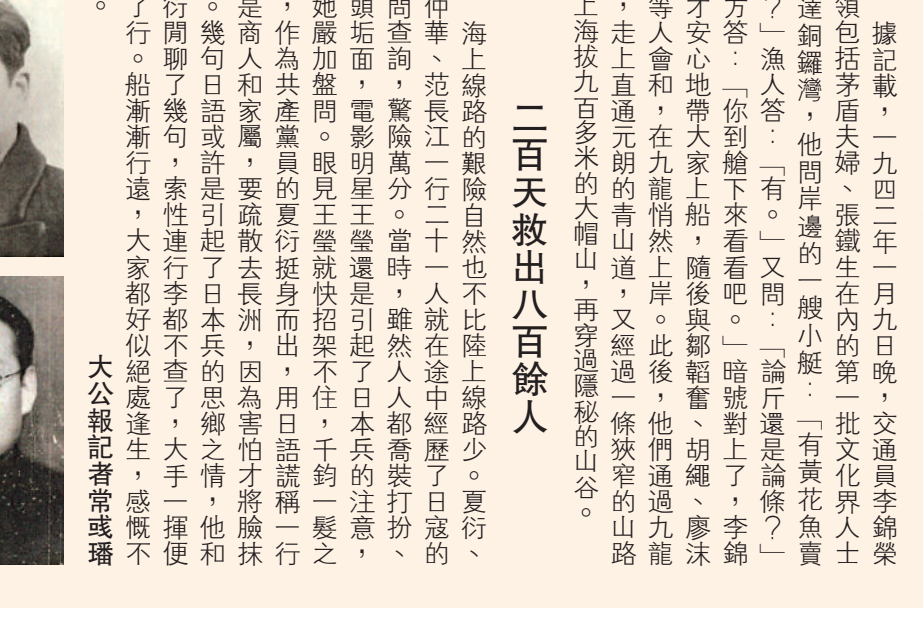
話你知  
八鄉楊家村一百二十一至一百三十號A，被列為二級歷史建築。根據古蹟辦事處的紀錄，「適廬」始創於一九三六年，業主是原籍梅縣的兩名印尼華商梅南及楊竹南(兩兄弟)。歷史建築群包括門樓、主樓及附屬建築，歷經逾八十載，楊氏後人至今居住於此。  
這幢建築物屬客家圍屋，是典型的粵東式圍屋，南面建有門樓，外牆圍以火形山牆。興建時適逢日軍入侵，因此傳統客家圍屋的池塘和圍屋都不能興建。「適廬」位於建築物正中央，門外對聯「適居仁里、適境人祥」，內設有楊家村「敬啟堂」。  
「適廬」的特色除了是華商新界投資的見證外，亦是抗日戰爭時期東江游擊隊的根據地之一。當年游擊隊在此藏身一年，獲得東江游擊隊營救的愛國人士和文化名人，便由此通過深圳河逃避日軍追捕。

千餘人回國參加東江縱隊  
一九三八年十月，香港同胞將慶祝十節宴會款項改作捐募軍衣，香港七十六個商團聯合籌募軍衣三十六萬件。其他賑濟團體、學生界則舉行贈旗募款，採購軍衣及防毒面具。一九三八年年底，香港九龍新界司機總工會的人工師傅，走遍港島、九龍和新界，籌集四千餘元購置了前方急需的救護車及藥品，開車前往桂林捐輸給八路軍。  
一九三九年初，按照宋慶齡的建議，香港的幾個婦女團體籌集了四百五百多種中國藝術珍品，運至紐約、巴黎和倫敦出售，所得收入用於中國的醫療救濟事業。  
此外，一九三八年月起，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先後組織了十五個工作隊和十二個服務團、兩個劇團及一個政工隊共五百多人回國。他們廣泛深入東江城鄉，慰問飢寒交迫、傷病侵擾的同胞，發放救濟糧食和衣物，免費給傷、病員治病，鼓勵受難的同胞行動起來，保衛家鄉。據不完全统计，從東江人民抗日武裝建立，再到一九四一年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前，先後參加東江人民抗日武裝的港澳同胞和華僑子弟有一千人以上。

血濃於水 港澳同胞支援抗戰  
香港在中國人民抗日鬥爭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，它曾是華南地區的抗日救亡運動中心。抗日戰爭爆發後，香港工委和香港海員工運總聯會中央的號召，在港澳地區積極開展抗日救亡運動。此外，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出錢出力支援抗戰，千餘人回國參加東江縱隊。  
香港各階層民眾自始至終關心和支援祖國抗戰。「七七事變」後，香港各界以援助抗戰為宗旨的社會團體紛紛成立，廣泛開展活動籌集捐款。從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三九年五月，香港學生聯誼會通過街頭賣花、賣物會、義演、義演、節食活動等方式，募得兩萬餘港元。  
千餘人回國參加東江縱隊  
一九三八年十月，香港同胞將慶祝十節宴會款項改作捐募軍衣，香港七十六個商團聯合籌募軍衣三十六萬件。其他賑濟團體、學生界則舉行贈旗募款，採購軍衣及防毒面具。一九三八年年底，香港九龍新界司機總工會的人工師傅，走遍港島、九龍和新界，籌集四千餘元購置了前方急需的救護車及藥品，開車前往桂林捐輸給八路軍。  
一九三九年初，按照宋慶齡的建議，香港的幾個婦女團體籌集了四百五百多種中國藝術珍品，運至紐約、巴黎和倫敦出售，所得收入用於中國的醫療救濟事業。  
此外，一九三八年月起，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先後組織了十五個工作隊和十二個服務團、兩個劇團及一個政工隊共五百多人回國。他們廣泛深入東江城鄉，慰問飢寒交迫、傷病侵擾的同胞，發放救濟糧食和衣物，免費給傷、病員治病，鼓勵受難的同胞行動起來，保衛家鄉。據不完全统计，從東江人民抗日武裝建立，再到一九四一年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前，先後參加東江人民抗日武裝的港澳同胞和華僑子弟有一千人以上。

二百天救出八百餘人  
海上線路的艱難自然也不比陸上線路少。夏衍、金仲華、范長江二十一人就在途中經歷了日寇的盤問查詢，驚險萬分。當時，雖然大家都喬裝打扮，蓬頭垢面，電影明星王曼曼還是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，對她嚴加盤問。眼見王曼曼就快招架不住，千鈞一髮之際，作為共產黨員的夏衍挺身而出，用日語謊稱「一行人是商人和家屬，要疏散去長洲，因為害怕才將臉抹黑。幾句日語或許引起了日本人的懸疑之情，他和夏衍開聊了幾句，索性連日軍都不查了，大手一揮便放了行。船漸漸行遠，大家都好似似獲重生，感慨不盡。  
大公報記者常瑞瑤

妙設樞紐 雁過無痕  
一九四一年十一月，香港淪陷，大批愛國民主人士和進步文化人士滯留香港。正當日軍四處張帖告示，限令愛國報章、茅盾、梅蘭芳和蔡楚生等文化人士前去日軍軍部報到時，他們卻已經在嚴密的封鎖下「人間蒸發」，並在數月之後安然出現在抗日日後方和根據地。這場由黨中央指導、東江縱隊執行的大營救歷時二百天，突破日軍、偽軍、土匪設置的重重關卡，共營救出八百餘人，無一失散。  
十二月七日，受黨中央指示，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兩次急電香港工作負責人廖夢生、潘漢年、劉少文，要求他們迅速做好應變準備，「許多重要民主人士、文化界人士被困留香港，他們是我國文化界的精神，要想盡一切辦法把他們搶救出來。」  
暗語：有黃花魚嗎嗎嗎？  
據記載，一九四一年一月九日晚，交通員李錦榮帶領包括茅盾夫婦、張鐵生在內的第二批文化界人士到連銅鑼灣，他們乘連的「小艇」，「有黃花魚嗎嗎嗎？」漁人答：「有。」又問：「請還是請條？」對方答：「你到牠下來看看。」暗語對上了，李錦榮才安心地帶大家上岸，隨後與鄒韜奮、胡繩、廖沫沙等人會和，在九龍悄然上岸。此後，他們通過九龍城，走上直通元朗的青山道，又經過一條狹窄的山路登上海拔九百多米的「大帽山」，再穿過隱秘的山谷。



廖承志 潘漢年